

9-2006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蔡鴻生)

Chua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王川 (2006)。《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蔡鴻生)。《嶺南學報》，新第三期，361-36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3/iss1/18

This 新書評介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蔡鴻生著。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4+3+1+269頁。

蔡鴻生(1933-)《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是大陸學界研究粟特與突厥學的最新成果。書甫出版，即備受學界重視。就筆者所知，大陸已發表以下數篇書評：(一)謝方，〈呼之欲出的中國突厥學〉，《光明日報》，「史林」，292期(1999年8月27日)。(二)余太山，〈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書品》，1999年4期(1999年8月)，頁29-34。(三)榮新江，〈書評：《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唐研究》，5期(1999年12月)，頁519-522。(四)若夷，〈如何追蹤文化交流的軌跡——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24日。(五)董少新，〈互證以求真——試談《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之史料運用〉，《學術研究》，2000年3期(2000年3月)，頁79-82。(六)林悟殊，〈值得青年學者取法的西域史研究專著——讀《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西域研究》，2001年1期(2001年3月)，頁103-108。

此外，蔡著卷首有季羨林(1911-)所作的三頁序文，對該書有精闢的評論；尚虹，〈中華版中亞研究圖書評述(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356期(2000年10月)，頁16-24，論及近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亞研究學術專著時，稱蔡著「是近年來最具學術功力的中亞研究著作」(頁22-23)，可謂集諸家之識語。

按「九姓胡」，即「雜種胡」，古漢籍之謂中亞民族粟特人(Sogdian)。在古代世界史上，該民族以善商賈著稱，被目為「亞洲內陸之腓尼基人」。陳寅恪(1890-1969)校讀新、舊《唐書》時說：「雜種胡即中亞昭武九姓胡。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52)。關於「九姓胡」是否為九個，馮承鈞(1887-1946)早有「九姓不必代表九國」之論；見馮承鈞，〈何滿子〉，收入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179-180。至於「突厥」(Türk)作為一個歷史名詞，漢文史料首見於西魏文帝元寶炬(535-551在位)大統八年(542年)；這個「龐大的多部落國家」，實質上「是政治聯合的名稱，在民族關係上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蔡著，頁81)。隋唐之際，突厥崛起，成為亞洲內陸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蔡鴻生，〈陳寅恪與中國突厥學〉，收入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76)，且與當時亞洲大陸的唐帝國與阿拉伯帝國均有廣泛的聯繫。十九世紀末以來，考古學家先後發現大量的

粟特文、突厥文寫本，還有碑刻等諸多遺物以及遺址，促成國際上粟特學、突厥學隨之崛起，迄今仍方興未艾。

蔡鴻生五十年代就學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一直留系執教。該系向有粟特學、突厥學的研究傳統。其名教授陳寅恪和岑仲勉(1886-1961)都是該領域的權威。陳寅恪〈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金明館叢稿二編》，頁52-53)，揭示粟特人在我國古籍中的稱謂；〈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97-108)，不僅提出「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結論，而且反覆唐室曾臣事突厥的「國恥」。1942年，陳寅恪為他以前「肄業於清華大學」的學生朱延豐(1906-1969)和姚薇元(1905-1986)所作的〈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頁144-14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42-244)尤充滿真知灼見。該等宏文乃為我國突厥學、粟特學之經典論著。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突厥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上下冊，以豐富的漢文史料及縝密的考證，成為突厥學研究的必讀之作。蔡鴻生正是師承這兩位前輩學者的傳統，其在本書的〈後記〉中坦言自己受到陳、岑二師之啟蒙和教誨，身在嶺南，心繫漠北，踏上了治學之途。

本書不僅師承陳、岑的研究傳統和治學方法，而且在中外學者研究已有的基礎上多所創新。全書分上、中、下三編，各以「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種與文化交流」命名，合共由十四篇長短不一的論文組成。整體而言，本書最大的創新有二：

第一，本書以九姓胡與突厥為研究的主體，闡述這兩個民族的文化(即書中所論「中亞綠洲城邦文明」及「漠北草原穹廬文明」)在唐代中原文化之外的獨立發展，因而成功擺脫傳統研究把粟特、突厥視為隋唐帝國附屬品的窠臼。

以往的史家著述，無論傳統之作如新、舊《唐書》，抑或新近之品如兩岸三地的諸多有關著作，大致均以隋唐帝國為中心，來論述粟特、突厥。蔡鴻生師法陳寅恪「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之論，給九姓胡和突厥重新定位，以平等眼光「談胡說蕃」，是為前人研究所無，不可不謂創新之舉。如上編論述九姓胡「城邦政制的多重結構」時，列舉七世紀初至八世紀中與九姓胡相關的政治變遷，指出這一百多年中「九姓胡已三易其主：突厥、唐朝，和大食」(頁5-8)，即為一例。國內學界不少憤於歐美學界之歐洲中心論，但殊不知自己陷於「中原中心觀」而不自覺。玩味蔡書這一立意，於學界當不無裨益。

第二，本書論證粟特、突厥二者在中古時代的互動關係與滲透現象，亦為以往學界所闕如。粟特與突厥作為隋唐時代輝煌、獨立的兩大文明，其兩者之

間「在中古時代的互動關係及其滲透現象」(頁1)，較之與中原王朝的交往更為密切。蔡著對此有精采的論述：(一)粟特依仗突厥的勢力，既是商人又是傳教者，遂得以發揮商業貿易與宗教文化傳播的雙重功能。(二)突厥則利用粟特人為自己的外交使節，進行商業活動。(三)因此粟特、突厥之間婚姻互通，禮俗互滲，語言辭彙多所互借(以上三解見頁6，15-16，24等)。該書「引言」所錄安祿山(?-757)與哥舒翰(?-757)二員唐代蕃將的對話，形象地表達出這種互動、滲透的關係：

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

本書撰寫的最大特色亦有兩點：

第一，詳略得當，史料堅實。

從本書十四篇長短不等的論文看來，作者做到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全書「語言凝煉，內容扎實」，「篇幅雖然不大，但含金量卻很高」(榮新江前揭文)。如論九姓胡之「胡名」一節，蔡著指出，「胡姓」之研究，經過桑原鷺藏(1879-1931)、向達(1900-1966)、馮承鈞、姚薇元等前輩學者的辛勤耕耘已結下豐碩的成果，而「胡名」則如陳寅恪所言「急待研討」。針對此狀況，蔡著於「胡姓」略而不言，而對「致力於此者寥若晨星」的胡名卻用功甚勤，他「循[著]中國文獻與粟特文物互證的原則」，運用1893-1911年分四冊出版之俄文《實驗突厥方言辭典》等工具書，結合漢文史籍，對吐魯番、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及九姓胡文物進行研究，考竟「祿山」為首的多個胡名之音義、常用詞尾及其涵義、突厥成分與宗教色彩(頁38-42)，所論令人折服，所言均為前人所未及。由是可見，作者身體力行地做到「引言」所說的「略人所詳」與「詳人所略」之旨。

「略人所詳」與「詳人所略」實為蔡鴻生學術著述之一貫作風，無論是單篇論文，抑或專著，無不如此。1994年，蔡氏在其清代中俄關係的專著《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前言〉中，已明確聲稱：「預定目標並非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述，而是略人所詳和詳人所略，不賢識小，拾遺補缺而已。因此，在結構上去追求教科書式的平衡和比例，有數千字一節的，也有數萬字一節的，錯落相間，聽其自然」(頁2-3)，錢鍾書(1910-1998)的《管錘篇》在體例上亦如此，不拘形式，以筆記體寫成，短則不逾百字，長者幾達二萬言。蔡氏此一風格，可謂得大師之精髓矣。

蔡氏為中外關係史專家，曾謂研究中外關係史，中國史料與外國史料同樣重要。在中國大陸，鑒於條件的限制，收集、研究外國史料不無困難，因此儘量努力之後，尚有不足，情有可原；但中國史料，若收集不全，則難辭其咎。本書正是堅持此理念。如書中的〈突厥年代學中的十二生肖〉一文，從《詩經》等先秦典籍有關生肖曆的零星記載入手，縱引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文書、魏晉與隋唐史料，竭澤而漁地網盡漢文史料，以補西人考證之不足，使關於突厥十二生肖曆源出中國的觀點得到更多更堅實的資料基礎。

第二，語言凝煉，易讀耐讀。

季羨林在其序言中特別指出：「還有一件形似細微實頗重要的情況，注意到的人似還不多。這就是：蔡先生的文章寫得好，瀟灑流利，生動鮮明。在當代人文社會學家中，實屬少見」。

余太山文開篇即道：「蔡鴻生先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這是一本以考據為主的史學專著，一般說來，這種著作是比較艱澀、枯燥的。但此書與眾不同，頗能引人入勝，且時有妙語雋言，令人回味無窮。即易讀又耐讀，實在難能可貴」。

榮新江文亦特別指出：「與當今利用先進微機所寫的動輒洋洋數十或上百萬言的著作相比，蔡鴻生先生的這本(我相信是)用手所寫的著作，篇幅雖然不大，但含金量卻很高。它沒有微機中自動蹦出的大量通俗詞句，讀起來使人感到語言凝煉，內容扎實」。

以上引文，足見各家對蔡氏文筆都十分欣賞。筆者之所以能數次通讀這本專業性極強的書也正是基於上述這一理由，故相信讀過此書的人必會有同感。昔賢倡導「惟陳言之務去」，蔡氏之書可謂恪遵是訓之範例。

王川
中山大學